



古史新辨



说史谈屑

# 明代福州府怀安县被裁之谜

甘满堂

## 王审知的海洋开拓精神

李永 葛宁

明代万历以前，福州府有三个附郭县：闽县、侯官与怀安，所谓附郭县就是指县衙与福州府署同处一城中办公，县治地理范围在府城是相邻而立。明万历八年（1580年），存在近600年的怀安县突然被裁，整体并入侯官县。现相关文章对于怀安县被裁多归结于怀安县城所在地易受水灾、交通不便等。但细读相关史料，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，怀安县被裁有个渐进的过程，涉及古代社会治理难以克服的制度难题。

明万历以前，福州城内设有闽县、侯官、怀安三个县衙，除闽县县衙一开始就设立于福州城内，其他两个都在外地前后搬迁进来。闽县始于隋开皇十二年（592年），由原丰县改称闽县，在府治东南。唐武德六年（623年），唐朝政府从闽县拆分设置侯官县，设立治所就是如今的闽侯县上街镇侯官村。唐贞元五年（789年），侯官县衙为洪水淹没，为避水患，时任福建观察使的郑叔则于贞元八年（792年）将县衙迁入现在的福州道山路。

宋太平兴国六年（981年），郡守何元昭以闽县有百里疆域，编户二万，官吏患簿籍繁，征输远等理由，分出闽县9个乡设置怀安县，9乡分别是：敦业乡、感应乡、八座乡、灵山乡、侯官乡、承平乡、移风乡、积德乡、同乐乡。怀安县城最初设在芋源江北三十里，即今闽侯县荆溪镇桐口村。北宋咸平二年（999年），福州转运使丁谓奏移怀安县城至南台岛北端的石邑村，即今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淮安村，改“闽越亭”为县衙署。自此，石邑称怀安（民国后又改称淮安）。明朝洪武十二年（1379年），县丞张希闵以县衙临闽江，而府城西北部都是本县地盘，奏移县衙至府城北，于是出现三个县衙同在府城的局面，三个县衙同在一城的现象在整个中国古代都是少见的。明初怀安县衙迁入福州府城，埋下以后县治被裁的伏笔。

明万历《福州府志》对怀安县被裁过程记载最为详细：国朝洪武十二年（1379年），县丞张希闵奏移入城今治，古罗城永安门外也。弘治间，给事中许天锡奏分闽、侯，下省臣议，裁减丞簿，县仍旧。万历初，巡抚庞尚鹏奏并侯官，增为五十里。

由明万历《福州府志》记载来看，明代怀安县撤县分成三个关键步骤，一是明朝洪武十二年（1379年），县丞张希闵奏移县衙入府城；

二是明弘治间，给事中许天锡奏裁怀安县，并给闽县与侯官县，但在裁减县丞、主簿两个官职后，县治仍保留；三是万历初，巡抚庞尚鹏奏并侯官县入侯官，侯官县户数增至50里（每里110户）。但这三件过程性大事都没有说明发生的具体原因。

当代学者多认为怀安县被裁是受水患影响，另外，明万历八年（1580年）洪山桥建成，怀安县城所在地交通重要性降低。怀安县城在仓山淮安村，三面都是山，宋代设县时，怀安县治开始修筑城墙，县城防范水灾应当不成问题，只是县城之外的洪塘更容易受到闽江洪水影响。至于明万历八年（1580年）洪山桥建成，应当是加强怀安县城与福州府城联系，有利于怀安仓山岛部分社会经济协调发展。

顺着明万历《福州府志》提供的线索，笔者在《明武宗毅皇帝实录》五十五卷中找到给事中许天锡奏裁怀安的具体建议。正德四年（1509年），吏科给事中许天锡奏：福州府城有闽、侯官、怀安三县，乞并侯、怀为一县，以节民费。至是，巡按御史韩廉报民不便，户部请县治仍旧，但移文守臣，视县之粮里数少者，革丞、簿各一员，而并其儒学于一。从之。

许天锡（1461—1508？），福建闽县人，明弘治六年（1493年）登进士，授庶吉士。弘治十一年（1498年）为吏部给事中，正德元年（1506年）转任工部给事中。许天锡作为福州闽县人，对于福州情况非常熟悉，本着关心家乡百姓疾苦、节省政府财政经费的角度，建议侯官与怀安两县合并。但是巡按御史韩廉称民众不便，反对；户部认为县治还要保留，但有发文给福州府，视赋税弱县革去县丞、主簿各一员，以节省财政开支。

当时怀安县拥有户数16里（每里110户），侯官县拥有户数34里，怀安县里户少，被革去丞、簿各一员，儒学也合并一处。明史《许天锡传》说其正德三年（1508年）因弹劾太监刘瑾而死，但这个时间与《明武宗毅皇帝实录》记载有冲突，《明史》是清人所修，也许记录时间有误，许天锡不可能死于明正德三年（1508年）。

在县丞、主簿两官职被裁设后，怀安县又在相对平静中度过70年时间，但在万历初年突然出现多事之秋。明万历六年（1578年）

五月，洪水冲击了侯官和怀安县，庄稼损失八成，秋天又遇大旱。《福建通志》卷六十五载，明万历八年（1580年）三月，裁撤怀安县，并入侯官县，县衙所有胥吏就地免职，带有惩罚性质。

后人认为怀安撤县是与前年全县遭洪灾与旱灾，百姓生计困难相关。但审阅相关材料，怀安撤县还有其他因素要考虑。《福建通志》卷六十五在万历八年（1580年）撤县后，还加了一条注释：“先是升平日久，田亩冲崩及里胥飞洒，各县浮粮难以计数。巡抚刘思问奏请丈量，报可，乃沿丘履亩，逐一清丈，然奸猾舞文，其害尤甚，不过取足原额而已，闽阨之病未瘳也。”有田才有田赋，然而到了明中期，“天下额田已减半”，所失额田均被官僚绅衾地主利用“飞洒”“诡寄”等手段侵占。

“飞洒”特指明清地主与官府吏胥勾结，将自己的田地赋税分散挂到其他农户的土地上，以逃避赋税的一种手段。“诡寄”是指将自己的田地伪报在享有免赋役的人（如乡官、生员）名下，借以逃避赋役的一种方法。“诡寄”也是“飞洒”的一种方法。从《福建通志》中记载的顺序与时间上来看，怀安县之所以最终被合并，很可能与丈量田亩之事弄虚作假有关，引起地方巡抚大员动怒，重启正德年间许天锡的建议，裁撤怀安县。

笔者再从《明神宗显皇帝实录》万历八年（1580年）回实录中查找，在第一百零四卷中找到裁撤怀安县的信息，还找到与其相关的两条涉及福建的信息，它们都发生在万历八年（1580年）九月；癸未，裁福建督粮右参政一员，及运盐司判官提举司提举吏目，又以省城并设三县不便，乃裁怀安县，自知县以下俱革。在这条资料前后还有两条：癸酉，福建清丈田粮事竣，抚臣劳堪以闻部覆请宜刊定成书并造入黄册，使奸豪者不得变乱，上可其奏；丁亥，裁福建建里甲均徭岁额六万四千五百余两。以上三条史料也有内部因果逻辑，裁福建省粮官与盐官，又裁省城怀安县，且知县以下都革职，原因在于节省省财政开支，以及惩治田地清查遇到官吏腐败问题；裁福建省巨额赋税，原因在于前年遇到灾荒，百姓生计困难，而这也是裁减官更的原因。

明万历年间，政府财政紧张，不仅仅因为自然灾害与官吏贪腐，还与明政府军事开

支较大相关，当时北方防范蒙古入侵，东南沿海防范寇患骚扰，都要耗费大量钱财。万历八年（1580年），福建巡抚庞尚鹏认为福州府城三县分立，冗员较多，为节省开支，奏请裁怀安县入侯官县，知县以下俱革职，得到明廷准许。

整个明朝福建省共裁两个县，新增设十个县。明代被裁县两县，除福州府怀安县之外，另一个是兴化府兴化县，被裁缘由同怀安县。明代正统十三年（1448年），因境内只有三乡四百余户，为减轻百姓负担，兴化县撤并进入莆田、仙游、永泰三县。

新增设县治的原因都是为了加强地方治安管控能力，防止民众造反。明代中期，叶宗留、邓茂七起义被镇压下去后，福建增设永安（景泰三年即1452年）与寿宁（景泰六年即1455年）两县；王阳明镇压赣南与闽西南民变后，奏请增设平和县（正德十三年即1518年）。其他新增县，如漳平（成化七年即1471年）、归化（成化六年即1470年，1933年改称明溪县）、永定（成化十四年即1478年）、诏安（嘉靖九年即1530年）、大田（嘉靖十四年即1535年）、海澄（嘉靖四十五年即1566年，1960年与龙溪合并称龙海县）、宁洋（隆庆元年即1567年，1956年撤销，分隶漳平、永安、龙岩三县）等7县都是在小股农民起义被镇压后增设的。

明代福建新增十县命名，多带有“安宁和平”等字样，这也透露出增设县治的主要目的，但增设县治也会加重百姓负担，埋下社会不稳定的因素。增设县治也反映出明帝国社会治理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制度困境。

在中国古代史上，像明代福州府三县同城而治还有多个，如西安、洛阳、苏州等也在不同朝代曾三县同城共治，但福州历时共201年，创造中国历史三县同城共治时间最长的纪录。

历史上数县同治一城形成的原因，大多数都是因为这些地方是区域政治、经济、交通与军事中心，人口众多，需要多设县治加以管理，但多附郭县也带来府城治安司法管理重叠、县级官员忙于迎合府省官员、冗员较多等问题。民国二年（1913年），闽县与侯官县合并成闽侯县则是全国统一行动，目的在于提高区域中心城市行政管理效率，减轻财政负担。

（作者单位：福州大学社会学系）

# 闽南剪瓷雕：屋顶上的一出戏

范五三 陈露颖 文/图



永春惠仙寺



泉州通淮关岳庙



漳州东山关帝庙太子亭

在闽南地区的庙宇和祠堂的屋顶上，我们常常能够看到一出好戏。它们是用五彩斑斓的陶瓷碎片，一片片嵌入未干的灰泥之上而形成的一种装饰艺术——剪瓷雕。

剪瓷雕又称“剪粘”“剪花”或“嵌瓷”，是闽南、粤东和台湾一带工匠们在建筑物屋脊上现场制作的技艺，具有个人即兴创造的艺术特征。剪瓷雕出现在屋脊的脊堵、脊尾和排头等部位，其图案内容表达集雕塑、陶瓷、绘画、戏剧等多种艺术门类为一体，因其色彩鲜艳华丽，作品又有教化意义而获得人们的青睐。

剪瓷雕的装饰表现题材主要集中在祈福教化、辟邪厌胜、祈愿祝福等方面，目的在于引起观者共鸣的同时，也能引起他们对宗教的虔诚和情感。匠师会根据建筑用途、剪瓷雕使用部位选择不同题材和技法，就图式而言，大致可以分成戏剧故事类、花鸟鱼虫类、飞禽走兽类、博古等类型。

剪瓷雕从造型形式上可以分成平雕、圆雕、叠雕和浮雕四种。平雕着重于重复性的构

图，常见于室内的壁画以及屋脊的配景装饰上；圆雕难度最大，要先用铁丝或竹篾做骨架，再用糖水灰和着泥灰打泥坯塑形，再粘上瓷片，多用于塑造古装戏曲人物的服饰，使人物外形更加饱满立体；叠雕富有层次感，多用于塑造古建筑屋顶的游龙戏凤、飞禽走兽和花草树木上，层层叠贴的表达方式让祥瑞动物和植物的造型更加栩栩如生，富有张力；浮雕用于表现道具与主要场景，还有一些反映民间故事情节的高浮雕或浅浮雕，以此体现其丰富性。

剪瓷雕的具体制作分有手工和预制两种。一种是“现场制”，在屋脊高处进行现场制作，适用于屋顶的大型装饰。在屋脊较高位置的剪瓷雕，距离观众较远，工匠用夸张的手法、色彩明快的瓷片、肆意造型来装饰建筑，比起“现场制”，“预制式”的剪瓷雕一般装饰在距离观众更近的墙头牌（檐楹）等处，对工匠的功底细腻、手艺精湛等方面有更高的要求，才能够有极强的画面控制能力，例如永春惠仙寺屋脊上的青龙便是预制件。

剪瓷雕的制作流程十分复杂。首先，要先绘制出剪瓷雕作品的大致图样，并且确定作品的施作位置，再塑造物体的雏形，用钢筋和铁丝等材料作为骨架，骨架的稳固程度与剪瓷雕的成品质量高度相关，因此必须要请专门的铁匠师父来制作。

其次，要调制坯体使用的灰浆，需将贝壳灰与河沙、红土、稻草等材料按一定的配比拌匀，再掺入红糖或糯米汁，这样可以有效地增强灰浆的黏性，再趁其未干时涂抹在骨架上。接着，在坯体灰浆未完全干时，把事先裁剪好的瓷片贴到想要的坯胎上。

以前使用的瓷片是将碗、碟剪成碎片后使用，近年来大都改用预先烧制好的釉彩瓷片，不仅可以调制颜色，还可以增加作品的整体性。最后，匠师们还会利用彩绘对剪瓷雕的背景和细节部分进行修饰，加强作品的体色色泽，强调其戏剧效果，营造作品氛围。经过这样特殊方式处理的剪瓷雕作品更能经受风吹日晒的洗礼。

（作者单位：福建理工大学）

历代闽地政权，可谓“三面环山一面向海”，唯有“向海而生”，方能在强敌四伺的纷乱世道中求得生存，在“阔地狭，国用不足”的物质条件下寻求发展。王审知作为唐末五代时期闽地的重要统治者，入闽后也继承并发展了这一精神。

从唐昭宗光化元年（898年）担任威武军节度使算起，至后唐庄宗同光三年（925年）去世，王审知统治福建28年之久。其间，他坚持向中原政权进贡，历经李唐、后梁、后唐三朝更迭而不辍。这表明王审知具有高超的政治智慧，能够保持清醒、理智、务实的政治头脑。

若按传统路线，福建地区向中原进贡，多取道浙西衢州（今浙江衢州）、江西信州（今江西上饶），然后向西北入饶州（今江西鄱阳县），从池州（今安徽池州）一带过长江后，再沿舒州（今安徽潜山）、庐州（今安徽合肥）、寿州（今安徽寿县）一线过淮。但五代时期江淮地区被吴国的杨行密控制，杨行密与朱温交恶，导致这条沟通南北的陆路交通被切断。当时中原政权如果派遣使节到福建、浙江，必须借道湖南、湖北以及广西的荆、襄、潭、桂等州，先进入广东，然后再沿海路北上。

陆路交通的断绝并没有拦住王审知北上进贡的步伐。他开辟了一条从福州出发，途经漳州、台州、明州（今浙江宁波），直抵山东登、莱等港的海上进贡之路。这条海路风大浪险，且沿途多浅滩，福建的尖底船极易搁浅断裂，加上福建船员对这段航线比较陌生，缺乏相关海域航行经验，所以极易发生事故，“深没者十四五”。

即使如此，王审知仍然不计代价地继续探航。这条海路不仅确保了福建贡品的北上，而且关系到王审知统治权威的合法性，进而关系到他统治地位的稳固。这一海路的打通，也对后世闽国政权存亡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后晋时期，南唐进军福州城下，围城达数月之久，吴越水军自海道解救闽国，便是从白虹浦一带（今解州大桥至中平路一带的福州沿岸）登陆，和闽军里应外合解救了围城之急。可以说王审知开辟的海上进贡之路实为闽地政权安身立命的“生命线”，体现了王审知海求生存的务实执政理念。

王审知对海洋的开拓利用，还体现在对对外贸易航线的开辟与维护之上。在此方面，最为著名的事件便是甘棠港的开辟。甘棠港的地理位置，目前尚无定论，但学界对该港的开辟目的却并无争议，均认为王审知是为了招徕蛮夷商贾，也就是发展海外贸易。王审知还设置了榷货务，由他的老乡张睦掌管。张睦积极招引外来商人，和善待待来自贸易的蛮夷商贾，确定合理的税收额度，确保对外贸易的和平发展环境。为了让沿海而来的外来商人顺利到达福州城下，王审知还疏浚福州城周围的河道，修筑南面诸城、水门以沟通江海，外来商船可以直抵福州城下，实现了“卸帆入舟”“蛮舶放棹，且次江岸”的便利效果。为了保障航线的稳定，防止海寇劫掠商人，王审知还注重修船练兵，打造了一支战舰多达千艘的海洋护卫队。

以上的做法都是为了招引外资，是在请进来。请进来之外，王审知还重视走出去。王审知侄子、泉州刺史王延彬在此方面功绩颇多，每次派出的商船均能化险为夷，顺利返航，所以被人称为“招宝侍郎”（相当于活的财神爷）。非唯福建官府，闽地的海商也沿着王审知开辟的航线，把本土所产的陶器、铁器等物资销往海外，并带回金贝等异域物产，从中获取丰厚的利润。

这条航线对之后福建的海外贸易产生了深远影响。不管是宋元时期泉州崛起为东方第一大港，还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繁荣，均不可忽视王审知开辟之功。由此言之，王审知可谓“海丝”先行者。

王审知所开之海路，可分为南北两线，如果说北上航线主要是为了寻求政治立足，那么南下航线则凸显了求富与图强的意图。王审知重视海外贸易、向海图强，是因为统治之初，百业待兴，城市建设、官俸俸禄、军队给养等均需要大额财政开支。但基于“阔地狭，国用不足”的客观条件，商舟之税，尤其是利润丰厚的外贸税收，便成为王审知在民不加赋的前提下，有效扩展财源的重要途径之一。因此闽地在王氏治下，既实现了“国用以富饶”的目标，又通过采取与民休息，采取轻徭薄赋之政，“敛不加暴”，收到了“公私富实”之效。

王审知的开拓精神，得到了海洋丰饶的回报。首先，大量的外来商船浮海而至。来自印尼、印度、新罗等地的商人沿海入江，在福州城外卸印船，随之而来的便是可观的外贸收入，很好地弥补了府用的不足，解决了经费紧张问题。王审知去世时，福建已经出现了仓廪充盈、带砺殷实的富裕状态。

其次，大量的异域珍宝输入福建。根据史料记载，王审知进贡给中原政权的物品中，有大量的象牙、犀角、香料、玳瑁、琉璃等。这些多为外来物品，很有可能是异域商人通过海路贩运而来。王审知墓中发掘出了玻璃碗的碎片，这是目前发现的福建最早期的玻璃碗。这种玻璃制品也非本土所产，当是通过海外贸易流入福建。

再次，福建地区成为域外诸蕃和中原地区重要的往来枢纽，前来朝贡者络绎不绝。以三佛齐、新罗为代表的域外政权，纷纷向福建派遣使者朝贡。三佛齐的使者还从福建中转，前往中原政权朝贡。越南占城国的国相金婆罗，曾在福州凤池西乡崇贤里的龙德外汤院沐浴温泉以治疗皮肤病。

航路的开辟也促进了福建和海外佛教文化的交流，王审知曾整理收藏佛经于寿山，为佛界一时盛事，以至佛齐诸国纷纷派遣使者渡海前来进贡。唐高宗天祐三年（906年）天竺僧人声明三藏曾来福州讲经求法，王审知在开元寺为其开设无边法会；后梁太平元年（907年）泉州僧人智宣游天竺诸国，向来梁进奉辟支佛骨及梵典经律。由于唐中后期以来陆上丝绸之路因战乱受阻，智宣、声明三藏便极有可能亦是通过海路航线往来于闽地与天竺之间。后唐天成三年（928年）新罗僧人洪庆曾从福州乘船出海，将一部写本《大藏经》带回朝鲜半岛。

（作者单位：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）